

明代剪刀灯

系列小说研究

乔光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7-5004-5938-6



9 787500 459385 >

ISBN 7-5004-5938-6 定价: 39.00元

明代剪刀灯

系列小说研究

乔光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乔光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04-5938-6

I. 明… II. 乔…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529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张报健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875

插 页 4

字 数 428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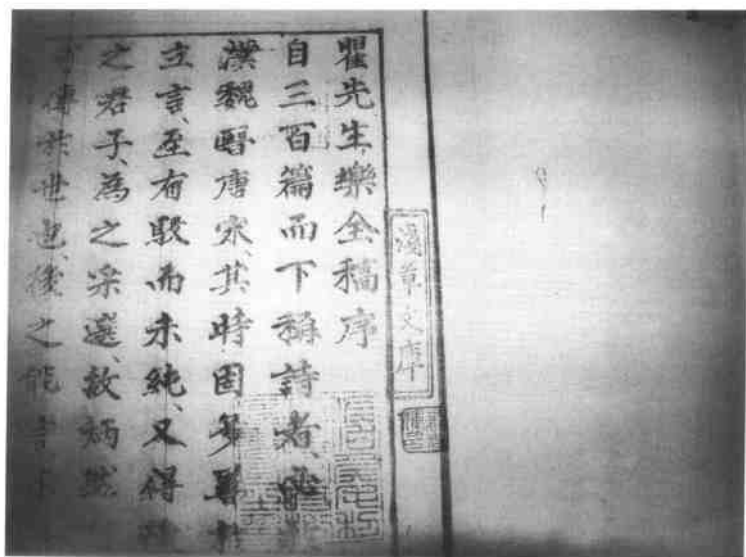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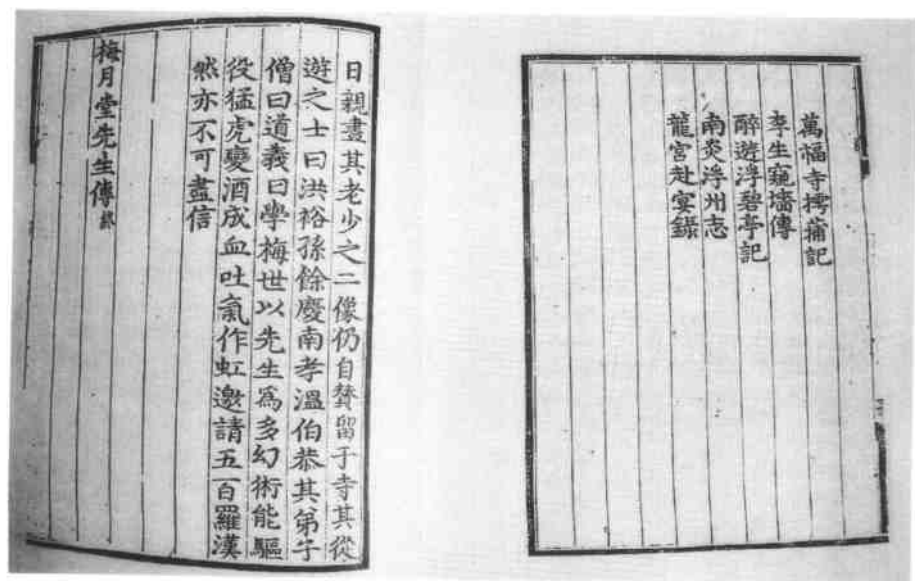
明正德楊氏清江堂刻本《剪燈余話》图影

明正德楊氏清江堂刻本《剪燈新話》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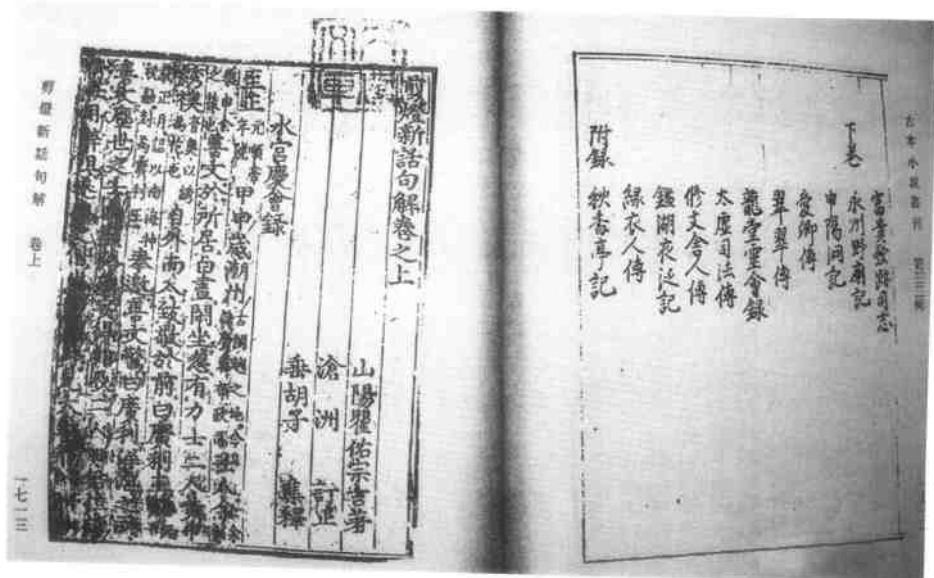
瞿佑《乐全稿》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图影，法国陈庆浩教授复印惠赠



《金鑒新話》朝鮮刻本图影，韩国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惠赠



越南阮岫《傳奇漫錄》書影



林芭《剪燈新話句解》圖影

重视对“剪灯”系列小说研究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序

陈美林

“剪灯”系列小说自明初出现，以迄明末，纵贯有明二百余年，不但对明代戏曲、小说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及易代之后的文言小说，同时流播海外。但学界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乔光辉专著的面世是一良好的开端。

一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至明代而空前繁荣起来，以戏曲而论，宋元南曲戏文融合金元北曲杂剧而形成的传奇，作品总数当在千种以上，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收 950 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又有增补；而存世者亦近二百部，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收有传奇 199 部，书后所附吴书荫《明传奇佚曲目钩沉》著录 126 种。同戏曲一样，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同样局面，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收明代小说 160 余种；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著录明代作品 688 种，其中有些作品是否属于小说，尚可斟酌，但也有失收者。由此可见，叙事文学两种主要形式——戏曲和小说在

明代的繁荣盛况。同时,无论戏曲或是小说的创作队伍,也由历来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或艺人编制,到了明代进而有文人学士掺入。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说:“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①王骥德《曲律》亦云:“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记。”^②小说创作亦复如是,一些文士认为小说有辅助政教之功能而进行创作。如简庵居士为《钟情丽集》作序时就认为该书作者为“卓越通才”,此作虽为“游戏翰墨”,但“他日操制作之任”,必能“经纬邦国,而与班、马并称”。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叙》中也认为:“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还有文人认为创作小说可以抒发情怀,如湖海居士在《西湖二集序》中就认为作者“周子(清源)间气所钟,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磊块,以小说见。”凡此种种缘由,导致“迄于皇明,文治革新,作者竞爽”^③的局面出现。

当然,有明一代小说戏曲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主要出现于中期以后,但在明代初期也产生了名著《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同时也出现了文言小说作家瞿佑(1347—1433)。只是学界对瞿佑的重视和研究程度,要远远逊于对《三国》、《水浒》的重视和研究。其实,瞿佑所创作的《剪灯新话》,虽然在其自序中称其主旨在于“劝善惩恶”,但所叙写的内容均为“近事”,“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在一定程度上还

① 沈宠绥:《度曲须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5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②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辑。

③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是对元明之际的社会现实作了同步反映；而其“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①，显然是一部优秀的文言小说，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启后代文言小说之繁兴，不但对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而且对传奇和杂剧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在瞿佑身后长时期内，仿效之作不断出现。《剪灯新话》于洪武十四年（1381）梓行以后不到四十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于永乐十七年（1419）成书，次年即永乐十八年（1420）自序中明言“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颦”^②，乃成此书。《余话》成书不及十年，又有仿作《效颦集》面世，赵弼在作于宣德三年（1428）的自序中称“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因题其名曰《效颦集》”^③。此后又有《花影集》出现，作者陶辅在其作于嘉靖二年（1523）的《花影集引》中说，他曾“较三家（《新话》、《余话》、《效颦》）得失之端，约繁补略，共为二十篇，题曰《花影集》”^④。此后近七十年，有邵景詹其人，自号自好子，于“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读书遥青阁，案有《剪灯新话》一编，客过见之，不忍释手，阅至夜分始罢”，进而“与客择而录之，凡二卷。客曰‘是编可续《新话》矣’。……命之曰《觅灯因话》”^⑤。其实，除上述

① 凌云翰：《剪灯新话序》，《古本小说丛刊》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李昌祺：《剪灯余话自序》，见董康诵芬室刊《剪灯二种》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③ 赵弼：《效颦集后记》，南京博物馆藏明嘉靖二十七年赵子伯重刻本《效颦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④ 陶辅：《花影集引》，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花影集》，见收于《中国古代孤本小说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邵景詹：《觅灯因话小引》，清乾隆辛亥（1791）巾箱本《剪灯丛话》。

数种外，受其影响而仿效者尚有《剪灯谈录》、《剪灯琐语》、《秉烛清谈》等等，不一而足。二百余年间，出现如此众多的仿效之作，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上也属罕见。至易代之后，对文言小说杰作《聊斋志异》亦颇有影响。甚至传播海外，诸如日本之《奇异杂记谈》、《御伽婢子》，朝鲜之《金鰲新话》、越南之《传奇漫录》等等，其中不乏瞿氏所作之影响在。

其次，《剪灯新话》的深远影响不仅表现在文言小说仿效之作众多，还对通俗小说乃至戏曲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通俗小说和戏曲的作者从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剪灯”系列小说中汲取故事情节，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审美认识重新创作出同样题材的作品。光辉君在论文中有所综述，前辈时贤考述甚多，笔者亦偶有涉及。如《剪灯新话》中之《金凤钗记》之与沈璟《坠钗记》传奇；《翠翠传》之与袁声《领头书》及叶宪祖《金翠寒衣记》二部传奇。以《剪灯余话》而言，《秋千会记》之于“初刻”中《宣徽院上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芙蓉屏记》之与“初刻”中《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合芙蓉屏》；《贾云华还魂记》之与《西湖二集》中“洒雪堂巧结良缘”。以《觅灯因话》而言，《桂迁感梦录》之与李玉《人兽关》传奇；《唐义士传》之与卜世臣的《冬青记》和蒋士铨《冬青树》二部传奇。而《花影集》中《心坚金石传》之与佚名作者传奇《霞笺记》；《刘方三义传》之与“恒言”中《刘小官雌雄兄弟》，以及戏曲作品叶宪祖《三义成姻》、范文若《雌雄旦》、王元寿《题燕诗》和黄中正《双燕记》等等。至于长篇通俗小说中受到“剪灯”系列小说影响者，如《花影集》中之《丐叟歌诗》，《金瓶梅词话》九十二回中有类似者；而《剪灯新话》中之《富贵发迹

司志》，光辉文中认为《儒林外史》有类似情节，并进而论证“外史”所受“剪灯”影响多处。凡此，都说明“剪灯”系列小说对于通俗小说（短篇、长篇）以及戏曲（传奇、杂剧）的影响甚远甚巨。虽经不少学人考索、研究，仍有可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尤其是对于这些作品在理清相互承传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似可进一步展开。

总之，“剪灯”系列小说这一课题是极富研究价值的。光辉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课题，是颇有识见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

四十余万言的《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颇有特色，略举一二。

首先，选题并非仅就《剪灯新话》一书进行研论，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剪灯”系列，诸如《剪灯余话》、《效顰集》、《花影集》以及《觅灯因话》等，从洪武以迄万历整个明代所产生的文言小说，因点及面，由面返点，可以从面拓展，从点深掘，相辅相成，不断深进，既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又可以进行后续研究；不重点深入剖析《剪灯新话》，所论必然肤浅；不全面探讨这一系列的其他小说，又难以对《新话》的历史地位作出切中肯綮的评价。笔者在为弟子吴波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作序时曾说，不专一家无以致精，而非兼讨众家也无以名一家，即此之谓也。在对“剪灯”小说作系列研究时，必须首先对《剪灯新话》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将研究面拓展至《余话》、《效顰》、《花影》、

《因话》，乃至整个明代文言小说，进而上溯唐宋传奇，下及清代蒲氏之《聊斋》以及纪氏之《笔记》；并进而对明代小说（文言的、通俗的）戏曲（传奇、杂剧）乃至诗文创作进行一些必要的探索。只有如此，方能对文言小说“剪灯”系列尤其是本系列第一部作品《剪灯新话》作出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孟子·离娄下》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赵岐注曰：“不尽知，则不能要言之。”^①不对明代“剪灯”系列几部重要作品一一加以研讨，也就难以论析这一系列的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作品《剪灯新话》。

其次，光辉此著既研究作家又论析作品。研究文学必须重视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的统一，透彻地了解作家，可以了解作家的生平际遇、思想感情与其创作的关系，也就是说作家的世界观如何支配其创作；深入地研习作品，则可以从作品反观作者的生活和思想以及创作意图，即《孟子·万章上》所云“以意逆志”。作家与作品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品中有作者的身影，但与作家身影并不完全一致，形象的意义经常超越作者的身影。因此，必须将作家研究与作品研究统一起来，相互发明，全面探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一稿，正包含了作家研究与作品论析两大部分。就作家研究而言，须做到“知人论世”，章实斋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光辉此著正是遵循这一传统进行研究的。例如增补前辈所作瞿佑年谱、自编李昌祺年谱、考索陶辅家世等等，均是“知人论世”之基础工作。又如，对作家生平际遇中的重要事件，在清理事实的基础上进

^① 焦循：《孟子正义》（下）所引赵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0页。

一步阐明其对作者思想的影响，如李昌祺“董役长干寺”与其佛教思想形成的关系。再如从作家的其他著述中探索作者的思想因子，在《雪航肤见》中探索赵弼的史学思想，在《桑榆漫志》一书中勾勒气理学说对陶辅的思想影响。复如从作家交游中探寻其思想倾向，如对瞿佑在杭州、南京以及在任职周府和谪戍保安等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交往人士进行搜索、寻究，从不同侧面展示瞿佑的生平和思想，等等。显然，这些考索都是很见功力的，对于解析作品也是极其重要的。就作品而言，该作既注意“系列”的共同特点，又对几部作品进行“个案”研究，将宏观考察与微观探析相结合。诸如考索《剪话》版本的流变，特别是对《余话》版本的考辨，对这几部作品中有关爱情题材、士子题材等的分析，都表现了作者的见地；以个案为基础，进而理清这几部小说的发展轨迹，阐述它们的承传、变异，如以“从崇情到扬理”来描述“从《剪灯新话》到《剪灯余话》”的发展；又如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剪灯”系列影响于海外文学进行比较，诸如揭示《剪灯余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揭示《雨月物语》首篇《白峰》与《剪灯新话》中《华亭逢故人记》二者为互文，等等，都闪烁着作者的独特见解。由此可见，乔君对“剪灯”系列小说的研究，无论是对作家的考索还是对作品的研习，都着着实实在在地下一番工夫。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论文作者搜索资料的努力。笔者反复叮嘱他必须认真做好搜寻、辨析资料的工作，不能满足他人所提供的现成资料，一定要自己开矿、炼铜、铸钱。光辉非常赞同，在书中也有体现。当然，学术研究不可能尽然屏除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文献资料的发掘、提供、引用，自然要有说明），但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或提出新的

资料，或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或得出新的结论，等等，只有有所创新，方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推动学术的发展。乔君此著中有他个人发掘、研究所得，读者也自会见出，不再一一列举。

三

从瞿佑创作《剪灯新话》始，这一系列小说都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瞿佑在序其《新话》时即表示其作“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凌云翰在序言中也称“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此后，王英为《剪灯余话》作序时认为该作“使人读之，有所惩劝”。罗汝敬、刘敬、张光启等人序言中也都有类似的评说。至于《效顰集》，赵弼在后序中说：“于劝善惩恶之意，片言只字之奇，或可取焉。”潘文奎在序中也说此集“褒善贬恶，潮显阐幽，皆得其好恶之正”。而《花影集》之作，也同样强调教化作用。张孟敬序云：“夫文词必须关世教、正人心、扶纲常。”再后问世之《觅灯因话》，作者邵景詹在“小引”中也同样主张“妍足以感，丑可以思”。当然，这几部小说在具体描写中所表露的倾向并不完全一致，或扬情，或崇理，或近乎史学，或融入哲学，但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则显然是这些作者的共同意念。之所以如此，也非偶然。我国的学术传统一向重视文以载道，从孟子、荀子以至扬雄、刘勰，乃至韩愈、周敦颐等人对于文、道的关系均有论说，尽管他们的诠释有种种不同，但他们所说的“道”，大都不离儒家之道，强调文以载道也就是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而在产生《剪灯新话》的明朝初期，文化专制主义空前严重，朱明政权又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据说朱元

璋读过“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高明《琵琶记》后表示：“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①在如此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中产生的《剪灯新话》及其同类作品中强调“教化”作用，也就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对既往的文艺作品不能因为他们主张“教化”而予否定，应该对他们所强调的“教化”内容进行细致的辨识并做具体分析。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②。可见，旧时代的“遗产”是不能全然弃置不顾的。自然，对于曾经影响着民族精神的我国传统道德，也就“不能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新内容”^③。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光辉在论文中涉及《新话》、《余话》中关于爱情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士子的生活命运的论述，也是很有意义的内容。可以让我们认识过去士人的性格，也可让我们反思自己，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以符合时代发展的先进的思想去“教化”现时的读者（包括作者和研究者）。其实，对于既往士人的种种缺

① 黄涛：《闲中今古录摘抄》，《丛书集成初编》第289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陷，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典籍或是国外近人的著作多有涉及，如《颜氏家训·文章》历数屈原以下，以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植、王粲、阮籍、嵇康、谢灵运、谢玄晦等“翹秀者”的负面性格，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其所著《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同样暴露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特等杰出士人性格中的阴暗面。但由于这些“精英”中的某些人，或善于自我掩饰，或由于他人作伪，一般读者只了解其正面，而不辨其负面，难以全面认识其人。笔者自20世纪50年代任教以来，就很关注这一问题。远的不说，在1994年国际儒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就曾涉及这一问题^①，在为弟子胡金望教授的博士论文《阮大铖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版）作序时，又提及这一问题，并引昭槱《嘯亭续录》卷三所记王鸣盛事：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贵家。每入宅，必双手作接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接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绥楚睡，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②

① 根据这一发言写成的《试论儒学对文学之影响》，为国外学者刊发于有关刊物：韩国《中国学研究》第10辑，1995年；日本《中国人文学会会报》1995年刊。又辑入《清涼文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昭槱：《嘯亭续录》卷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2页。